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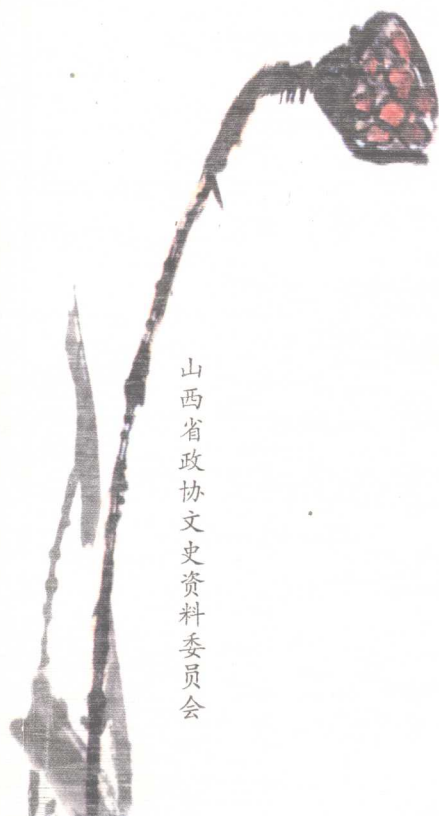
共同的

山西省政协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征文选

记忆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共同的

山西省政协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征文选

记忆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同的记忆：山西省政协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征文选 /
山西省政协文史委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34-2296-6

I. 共… II. 山… III. 改革开放—成就—山西省—文集
IV. D61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5525 号

责任编辑：李春华 秦珂伟 封面设计：冀建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印 刷：太原市众一彩印有限公司 邮编：030021

装 订：太原市众一彩印有限公司 邮编：030021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18.5 字数：1705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0.00 元(全套)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五台山的山门是这样敞开的

王艾生

1982年5月,国家旅游局邀请首都13家新闻单位的14名记者,赴山西省采访,考察山西的旅游资源,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文物古迹的保护和旅游接待的能力等情况。人民日报派我去参加采访。我们首先来到山西最北边的大同市,采访考察著名的云冈石窟、北岳恒山脚下的悬空寺和中外闻名的应县木塔。我们乘车来到千年古刹五台山,看到这里的状况令我们吃惊,令我们不解和困惑:寺院冷冷清清,极少僧人和游人;修葺半截的庙宇已停工,到处堆放着砂石、水泥、木料等杂物,偶而有几个朝山僧人匆匆来去;五台山中心的台怀镇,乱搭乱建小屋,无人问津;清澈见底的清水河正在被污染。整个五台山沉闷冷清,没有勃勃的朝气,似乎处于与世隔绝状态。

五台山,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又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方圆五百里,有东西南北中五座山峰环抱,形成“五台”独特的自然环境,其中北台海拔3058米,为华北最高峰。五个台的顶部是准平原化剥蚀面,形态平缓,蔚为壮观。五台山顶部平均温度为摄氏零下四度,这里气候凉爽,有“清凉山”之称。五台山内有庙宇39座,山外有庙宇8座,山中寺庙林立,清流潺潺,青山绿水,风景秀丽。这里最早的寺庙建于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年至75年)。现存的南禅寺为最古老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五台山各寺院庙宇藏有无数的经卷,有许多驰名中外的雕塑、塑像以及珍贵文物。五台山在中国佛教名山中的地位,独一无二,没有一座名山可以代替。这么一个著名的宗教、旅游胜地,却显出一片寂寞冷清的模样,极少僧人朝拜,几处破败的



庙宇用围布围了起来,通向山上的道路又窄又陡……据五台山管理所的负责人介绍,因为五台山上有涉及“机密”的某些通讯设施,所以只对归国侨胞、中国血统外国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这四类人员开放,不对所有人开放。每年上山的人很少,只有几百人。因为不对所有人开放,引起国人和外国友人以及佛教信众不满,纷纷投诉;因为不对所有人开放,庙宇的修缮及文物的保护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五台山文管所、五台山管委会、五台山民族事务所三家管理机构都插手五台山管理,有利益彼此相争,讲责任互相推诿,对庙宇的修缮管理,对五台山长远的规划,都没有一个通盘的考虑,都没有真正的财权、人权、甚至经常发生相互矛盾,相互扯皮现象,只是“维持现状”守“摊子”。

为彻底弄清真相,找到问题的症结,在管委会的大办协助下,我连夜召开“僧人座谈会”,请各住庙僧人谈出真实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听取他们对五台山现状的改进措施以及开放的诉求。一位僧人说:我们早就盼望五台山开放,我的朋友多次来五台山,都进不了山。一位僧人说:“文革”时期被赶下山的同伴,多次想回来,就是不让回山,请求政府能体谅我们的心情,尊重我们的信仰。

我根据上述种种情况,1982年7月8日写成一篇《五台山的一些见闻》的内参,刊登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1982年第395期上,这份内参写了四个问题:

- 一、五台山为何不能对外开放;
- 二、关于五台山文物古迹的维护问题;
- 三、五台山应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
- 四、五台山后继僧人和青年教育问题。

这份内参送达中共中央,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在内参上批示:“请宗教局、旅游局商有关部门解决,再开辟好这个文物、旅游胜地。一切同志和部门都要为国家的欣欣向荣作贡献。”为认真贯彻落实胡主席的批示,搞好山西文物保护,尊重宗教信仰和旅游事业,山西省政府召开了五台山工作会议,副省长卫逢祺主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寻求解决五台山开放的路子。最后商议确定这样几条原则:五台

山由五台县设制机构统一管理。省、地区政府部门,省、地区宗教、文物部门都不要插手管理;五台山上有关的通讯设施的安全问题,尽快协商有关部门解决,不能借故妨碍五台山开放;国家拨付修缮五台山庙宇的款项,要严加管理与审计,任何单位不得挪用、截留;尽快修筑扩宽太原至五台山公路,并整治五台山腹地的台怀镇乱搭乱建污染清水河的现象,使五台山更加干净、整洁。不久,国家旅游局韩克华局长又飞抵太原,为落实胡耀邦主席批示,与山西省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研究解决五台山开放中的有关事项。督促山西省各有关部门所承担的责任得以实现,为尽快开放五台山创造条件。为方便游客,北京至太原火车设五台山站,为登五台山多增加一条便捷的道路。这座闻名的千年古刹终于开放。五台山得以敞开山门迎接八方宾客,迎接世界各地的佛教信众。

(作者系原山西省政协委员、新华社驻山西记者站主任)



解州关帝庙的变迁

卫 龙



共同的记忆

如今,谈到我市的文物旅游龙头企业,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解州关帝庙。30年前的解州关帝庙,除中轴线的几座古建筑保存基本完好外,两侧东、西宫以及主庙对面的结义园皆是倾废的古建筑和零散的居户,杂草丛生,残垣断壁,给人满目疮痍的感觉。作为当时全运城仅有的几处文物开放单位,发展停滞,门庭冷落,各种服务设施几乎为零,根本谈不上“旅游”这个概念。30年后的解州关帝庙,已发展成为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世界华人敬拜关公的仰慕之地与知名文化品牌。回顾30年来的风雨历程,解州关帝庙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依托丰富的关公文化资源优势,在文物资源与品牌效益,关公文化与产业链条,景区发展与资源的保护利用等关键环节,积极探索,不断壮大,开拓出一条创新发展之路。

自1978年起,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作为诚信之神的关公愈来愈被人们所看重。利用关公文化资源,发展当地旅游事业,在上级领导部门中逐渐形成共识。也是从那时起,解州关帝庙文管所开始重视文化软实力宣传与文物的维修保护,景区的拓展与周边环境的整治,每年庙内大型文化活动和文物的维修保护工程接连不断。1985年至2004年间,他们先后争取各级政府拨款7000万元对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帝庙、结义园等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对非文物单位进行了说服搬迁,对景区周边环境进行合理整治。先后完成古建筑维修任务400余间,拆迁周边违章建筑4000间,建设解州关帝庙青石板广场31420平方米,常平关帝庙混凝土广场438平方

米,关帝祖茔混凝土停车场 36030 平方米,建三星级旅游厕所 2 座,硬化道路 5 公里,极大地改善了景区周边环境。由此,解州关帝庙从 30 亩扩大到现在的 330 亩;常平关帝庙将使用的乡政府迁出,并由原来的 20 亩扩大到现在的 40 亩;关帝祖茔从原来的不足半亩扩大到现在的 3000 余亩;单位收入也从 1990 年的 20 余万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1600 万元。

1985 年,“关公故里游”被确定为运城地区首批重点旅游线路之一。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关公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力度,解州关帝庙文物的保护维修实现了制度化、程序化。同时,关帝庙文管所又投资 1000 万元对常平关帝庙进行了整体规划和维修保护。进入 21 世纪以来,所里投资 3000 余万元,新建了关帝圣像景区,该景区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影视拍摄为一体,是一个大型文化园区。进一步满足了游客的需要。

为满足人民群众对关公文化的需求,解州关帝庙文管所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投入 2000 万元重点打造“关帝御花园工程”,建成后的御花园已成为游客和信徒朝拜、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对扩大景区面积,丰富景区内涵,提升景区档次,完善景区功能,增强发展后劲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关帝庙文管所在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还把提高和扩大“关公故里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做一件大事,常抓不懈。早在 1990 年 10 月份,由当时的运城地委和行署主办,解州关帝庙承办的“运城地区首届关公文化节”,旨在通过活动,带动地区旅游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首届关公文化节的举办取得了巨大成功:当年就为全区引资数亿元,签署意向合同几十个。1990 年至 2007 年举办关公文化节的十几年,是关帝庙文物旅游事业取得重大发展的十几年,也是我们的认识不断得到升华、思想不断得到解放的十几年。

在举办关公文化节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活动,人们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关公文化节也由最初的试着办,发展成为中国“十大人物类”节庆活动之一,“关公信俗”已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举办关公文化节,塑造了关公这一主题形象,提高了解州关帝祖

庙在世界所有关帝庙中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时提高了运城在全球的地位,架起了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在 2007 年的 CCTV2007 中国魅力城市评选活动中,运城在众多的参选城市中脱颖而出,荣膺全国十佳城市桂冠。

(作者系运城解州关帝庙文管所所长)



百团大战纪念碑建设纪事

刘芝田

1985年1月25日,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在太原三晋大厦召开。我以阳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省委宣传部部长张雨田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各地市都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一些有意义的纪念活动。当时,我就考虑,阳泉搞个什么活动最有意义?想来想去,想到了抗日战争时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战果辉煌,威震中外。阳泉是这次战役第一阶段的主战场之一,战斗最激烈的一仗就发生在狮脑山上……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在阳泉建立一座永久性的百团大战纪念碑,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抗日英雄们的丰功伟绩,教育后人牢记昨天的血泪艰辛,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和未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就把这个想法,在会议召集人汇报会上提了出来,得到了听汇报的省委副书记王克文同志和省委宣传部领导的支持。省委宣传部的同志还特意告诉我,中央有规定,要建这样的纪念碑,需要经过上级党委的批准。你们要建碑,回去后要抓紧准备申报。

会议结束回到阳泉后,我把建立百团大战纪念碑的意见,向市委书记靳广杰同志作了汇报,征得他的同意后,又和市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一起做了一些初步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核实史料,起草给省委的请示报告。3月21日,我在市委常委会议上向大家汇报了在阳泉建立百团大战纪念碑的意义和理由,并提出了建碑的初步意见。市委经过讨论,同意了

我的建议,并决定:在市区建立百团大战纪念碑,要求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日前完成。第二天,市委书记靳广杰同志就亲自签发了中共阳泉市委、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在我市建立百团大战纪念碑的请示报告》。

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温幸同志于4月8日批示:“拟同意建碑。先由省党史办给予确认,拟用群众义务劳动修建。”4月15日,经过省委党史研究室办理完史料核实与建碑确认手续后,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宣部[1984]12号文件的规定,于4月29日向省委提出了“同意以群众义务劳动形式建碑”的报告,这个报告由省委常委、秘书长张长珍同志和省委副秘书长郝占敖同志签署后,省委书记李立功同志于5月4日作了批示,同意建碑。为了赶在9月3日前建成纪念碑,市委的报告送出后,我曾多次给省委办公厅、宣传部打电话催办。当时经办这件事情的郝占敖同志是我在《山西日报》工作时的老领导,他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决定把李立功同志的批示和有关资料,用传真发到阳泉市委,并电话通知我,不发文件了。这样,省委5月4日的批文,5日隔了一个星期天,6日上午市委宣传部就收到了。收到省委的批示后,6日下午,就召集市委宣传部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开会进行研究,准备第二次给常委会汇报。5月13日,市常委会开会专题研究、讨论、通过了市委宣传部起草的《阳泉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活动方案》。方案规定,把建立百团大战纪念碑列为该活动的第一项任务。为了加强领导,市委还决定成立了由我任组长,副市长辛贵玉、市委秘书长莫显标、市政府副秘书长魏长生任副组长的领导组,领导组下面设了办公室、资料组、建碑组、宣传报道组、文艺活动展览组等5个临时工作机构,建碑组办公地点设在市城建局,其任务是选址、征集设计方案和组织施工。把碑建在什么地方?当时我心里没有底,常委会只原则地提出建在市区内。为了尽快把碑址确定下来,5月20日前后几天,我和辛贵玉同志实地察看了南山公园、儿童公园、阳钢转盘几个地方,但都不理想,一直定不下来。大家正在讨论这件事时,建碑组负责人王树林同志提出,应该把纪念碑建在当年发生战斗的地方——狮脑山上,后经市委领导和各方面专家讨论,到8月份才最后定下来,把纪念碑建在狮脑山



上。与此同时,领导小组还在《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上发布了“关于征集百团大战纪念碑设计图案的启事”,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就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设计方案 82 个,经过反复研究、比较、筛选,最后采用了北京城区建筑勘探设计所的设计方案。

为了永远纪念发动百团大战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市委曾决定请邓小平同志和聂荣臻同志为纪念碑题写碑名和碑词,后因我们的工作衔接不够,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最后改请彭真、薄一波、徐向前同志为纪念碑题了词。

由于我们工作缺乏经验,对建碑过程中的问题估计不足,当年建成纪念碑的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市委对建设纪念碑的时间,又重新做了安排。1985 年 9 月 3 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之日,百团大战纪念碑正式奠基。之后,又经过一番准备,建碑工程于 1986 年 4 月 5 日开工。在建设过程中,副市长辛贵玉同志积极组织有关部门,精心设计、科学施工,大家团结协作,勤俭节约,共同努力,克服了许多困难,保证了建设进度和工程质量。为了防止纪念碑建成后可能出现的沉降、倾斜,阳泉矿务局专门为稳定地基,留下了保护煤柱。北京矿院把碑基的设计作为科技攻关项目,先后设计了 7 个方案,经过许多专家的反复论证,最后确定在三角形纪念碑基础底下,每个角里埋进两台 320 吨的液压千斤顶,一台电子预测重量平衡仪。这样,一旦碑体稍有倾斜,电子预测仪便会显示出来,自动调整液压千斤顶的高度,使碑体永远保持直立和平稳状态。当时,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一项新技术。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共同为纪念碑精心设计了 6 幅共 364 平方米的大型浮雕和一座 7 米高的大型圆雕,并由沈阳锻铜厂负责制造完成。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纪念碑于 1987 年 6 月 30 日建成。

1987 年 7 月 7 日,中共阳泉市委、市政府在狮脑山上举行了纪念“七七”事变 50 周年暨百团大战纪念碑落成典礼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省、市党政军领导和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学生代表共 1000 多人。当年参加过百团大战的部分指挥员也应邀出席了大会,他们是:中顾委常委陈锡联(指挥狮脑山战斗的八路军 129 师 385 旅旅长)、孔庆德(原武汉军区副



司令员)、卢仁灿(原海军副政委)、安庆洙(原中央机要局局长)、肖峰(原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李希庚(中央军委办公厅负责人)、李懋之(原第二炮兵副司令员)、李居田(原军事科学院正师级研究员)、郑国忠(原海军副司令员)、赵冠英(原军事学院教育长)、桂绍彬(原海军顾问)、葛秀峰(原工程兵副司令员)。陈锡联、赵冠英、王茂林(省委副书记)、路正西(市委书记)都在会上讲了话。当年亲自指挥狮脑山战斗的陈锡联将军,参加了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后说:“把百团大战纪念碑建在狮脑山上,最有象征意义了。”

1997年6月,百团大战纪念碑被中宣部等16个部委命名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十年来,到百团大战纪念碑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已超过百万人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赓将军的夫人傅涯、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董必武的女儿董良晖、左权的女儿左太北、彭德怀的侄女彭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许信上将,原山西省军区政委李布德少将都来这里参观访问过。2005年6月28日,由山西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广播电视总台、阳泉市委、阳泉市政府、阳泉军分区共同主办的,山西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太行吕梁颂”合唱大赛启动仪式在百团大战纪念碑下举行。省、市党政军领导出席了启动仪式。由阳泉各界人士4000多人组成的12支合唱队,在会上演唱了《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毕业歌》、《到敌人后方去》、《太行民兵》、《左权将军》、《百团大战振山河》、《保卫黄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太行精神颂》等歌曲。嘹亮的歌声,拉开了山西省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序幕……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英雄业绩,是一座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的丰碑!

(作者系原中共阳泉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市政协副主席)

西厢爱情胜地重放光华

全 毅

《西厢记》是我国十大古典喜剧之一,它的发生地——普救寺,随着《西厢记》的流传和中外文化交流,已成为中外文学界、史学界、戏剧界、艺术界等各界人士十分关注的一所胜地。近20年来,中外学术界人士,尤其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胡耀邦同志,曾提及和询问过普救寺的现状和有无修复可能等情况。1961年1月,我国戏剧大师田汉同志曾亲临普救寺考察,并绘制草图,倡导修复这一文化胜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永济县政府曾上报省政府,要求修复普救寺,但均因当时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了祖国的大地。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前来普救寺参观的游客一年四季络绎不绝。我国著名西厢专家王季思、吴晓铃、蒋星煜、马少波等都先后来这里作专题考察,并来信来函倡议修复普救寺。著名蒲剧表演艺术家、全国六届人大代表王秀兰同志以及政协委员等,都提交议案,呼吁修复驰名中外的普救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西厢专家、学术界人士的倡议,引起了省、地、县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从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古代文明,振奋民族精神,发展旅游事业,进行国际间的友学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出发,认识到普救寺的修复势在必行,应该列入议事日程。

在一个仅有残垣断壁和极少数建筑物的胜地遗址上。绘制出一幅具有唐宋风貌的普救寺图画来,的确是一件难度相当大的工作。承担设计任务的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的工程设计人员,人人修西厢、爱西厢、把心贴



在工地。高级工程师,山西省古建所长柴泽俊,古建工程师吴克华,曾多次带领设计人员到现场进行考察,并从1986年5月开始,进驻普救寺开始了艰苦细致的规划设计工作。为了弄清普救寺的历史面貌,寻找设计工作的科学依据,作了大量的考证工作。那时的普救寺,除了残垣断壁,就是连片的废墟,而且是荆棘丛生,杂草满寺。同志们白天顶烈日,冒酷暑挖掘基址,测量数据,晚上加班加点,翻阅资料,讨论方案。由于工程时间急迫,柴泽俊、吴克华同志为寻找依据,查阅资料常常熬到深夜,为讨论总体设计方案,不怕盛夏酷暑高温,不怕蚊虫叮咬,曾几次奋战通宵。他们先后查阅了上百万字的文献资料,指导开挖了23条宽1.5米深的探沟,清理测绘了建筑遗址20余处,出土并整理了古建筑砖瓦饰件和佛教文物上千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个月的苦战,到8月下旬,他们胜利地完成了普救寺复原工程的总体设计任务,编制设计任务书和总体概算书,绘制了普救寺的地形地貌图、复原总平面图,复原透视图,并及时上报主管部门审定。这一工作的胜利完成,为普救寺修复工程奠定了基础,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按常规来讲,总体设计任务的完成,必将有一个间歇和整修阶段,但设计人员清醒地认识到,单项施工图纸的设计将会更复杂、更困难。因此,他们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立即又投入了施工图设计的战斗。

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的领导同志十分关心普救寺的修复工程。时任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的白清才同志还在百忙之中专程亲临工地视察和指导工作。原地委书记王学良同志多次到工地检查工作,并帮助解决施工中的木材、油料等问题。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将修复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深入工地,具体指导帮助工作。

承担施工任务的永济县工程公司古建队,始终把修复工程当作千秋大业,坚持做到了人尽其力,材尽其用,精心制作,保证质量。为了确保工程进度,他们严寒隆冬不停工,阳春三月加班干。古建筑的修复,相比之下要比现代建筑复杂得多,普救寺所恢复的20多座古建筑,大小高低不等,时代形制各异。一座20米高的宋式藏经阁,仅大小木构件就达5000余个,而每个构件又全靠手工制作,其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古建队的同志们,

就是凭借自己的双手,完成了每座建筑的部件。施工条件差,吊车用不上,他们硬是靠自己的肩膀,把笨重的斗拱、梁枋和屋架,抬到基址上。如今,当人们看到这一座座高大壮观的建筑时,无不为他们创造精神而赞叹。

普救寺复原工程,包括大小仿古建筑 23 座。其中,仿唐建筑 3 座,仿宋建筑 4 座。其余为仿明建筑。其规模之宏大,时代风貌之复杂、建设速度之快,工程质量之高,在省内乃至全国也是少有的。普救寺复原工程的完成,仅仅用了三年多一点时间,这是与修复工程指挥部同志们的无私奉献分不开的。

三年修复工程的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要想建设一个好摊子,必须有一个好班子。我们修复工程指挥部是在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下临时组建的机构,共有国家正式干部职工和临时人员 21 人,都是从县直单位借调来的。尽管是临时性的工作,但指挥部一班人却认识到,普救寺的修复是千秋伟业,对于反映我国历史文明,启迪今人,激励后代,发展旅游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能在修复工作中出一份力,发一份光,对个人来说是莫大的幸事。因此,同志们发扬“红娘精神”,把心血洒在工地上。

年过花甲的原县委书记卫东昌同志是我们的总指挥。他不仅坚持坐阵指挥,而且亲自解决工程中的难题,同时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讲修复工程重要性,讲党的优良传统作用,教育指挥部一班人开拓进取,廉洁奉公,人人都为修复工程出力流汗做贡献。他身先士卒作表率,工程急需材料,他出面联系;植树绿化短缺资金,他赴运城,上太原,向林业部门的领导汇报,争取到绿化经费。副指挥李益民患有冠心病,为了修复工程,他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常住工地,为工程排忧解难。一次,工地搬迁民宅遇到麻烦事,恰逢他老伴要到外地医院做大手术,他竟没有去陪同去伺候,而只作了简单的安排,又回到工地上坚持工作。在工地常上下攀登,使他的“腹股”病经常发作,他手捂肚子,忍着剧痛,坚持不离开工地。同志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从而受到鼓舞。副指挥申卫东,负责施工,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他坚持以工地为家,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从不叫苦叫累。为了使自己由外行变为同行,他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掌握了古建施工管理知识,保证了施工质量。工作人员



李满囤,人称“火头军”,工地上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一次因弥陀大殿披瓦,急需烟墨和赤土,当地又无货源,李满囤同志立即驾驶卡车奔赴太原,行程千余公里,一昼夜将货拉回,保证了施工的正常进行。

如果说普救寺修复工程进度快,质量高的话,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又有具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还有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密切配合,集中到一点,那就是有一大批富有“红娘精神”的新时期的创业人。

改革开放的浪潮,洗涤着人们旧的传统观念。三个冬春的奋力拼搏,永济县重新修复了普救寺这一古老而誉满人寰的“爱情圣地”。“中条山下古寺荒,空留方塔映斜阳”、“来在西厢下,额垣无片瓦”的感叹,早已化作一缕青烟,飘逝了!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江山再画存萧寺,文采风流重会真”、“普救寺坛复旧貌,五洲四海游客来”的繁盛景象。

修复后的普救寺,依坡就壑而建,巍峨壮观。山门前是苍松翠柏环绕的平整宽敞的寺前文化广场。三开间单檐悬山式的山门,坐落在两米高的台基上,威武雄壮的石雕狮子分左右守护着山门。山门正中上悬一匾,上书“普救寺”三个浑金大字,笔力雄健,气度雍容,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的墨宝。1988年笔者赴京为普救寺求赐墨宝时,赵先生听说这座古老文化胜地得以修复,兴奋之余,欣然命笔,为寺门题写了:“普愿天下有情;都成菩萨眷属”的楹联,表达了赵朴老对祖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关怀。

如今,游人至此,观赏“迎风户半开”的西厢,望着那越墙的杏树,体味着这爱情故事的温馨而留连忘返。“昔日普救寺传佳话,今朝游客络绎来。”普救寺的修复和重建,使一座久已消失的隋唐名刹,再现于中条山之麓与黄河之滨。日居月渚,春秋代序。今日的普救寺景区使人们更加向往。

(作者系原永济市政协常委)